

經濟發展同樣是政治問題— 評工商專聯的《香港廿一》

周柏均

(原載《信報》1993年6月6日)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最近發表一份本港未來十年經濟發展的報告—《香港廿一：展望香港經濟十年路向》，據說是耗資了五百萬元的研究成果。其實，工商專聯在89年亦曾發表一份同類型研究—《共建繁榮：香港邁向未來的五個經濟策略》。89年研究是以十年為期限，但為什麼工商專聯急於在92年要重新做一個以十年為期限的研究報告？相信主要原因是由於在90年代中港間的經濟和政治形勢，有重大的改變，所以需要對89年報告中的建議作出修改。兩份研究報告的差異其實反映工商界在本港政治體系內的地位轉變，以及與中方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緊密聯系。

工商界力爭有利的政治地位

工商專聯並不諱言他們是希望工商界的看法和意見，能夠在未來港府及中國政府制定政策時受到重視。工商界長期透過殖民地的委任制度，直接影響港府的施政。但隨著代議政制的推行，行政與立法分家，部份工商界人士已意識到他們對政府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九一年的立法局直選議席的競選中，民主派大獲全勝；而其後啓聯四名成員更被摒出行政局。工商界一直認為他們是創造香港經濟奇蹟的主要功臣，絕不希望讓其他人對他們認為促使香港成功的因素作出干擾。

隨著工商界在大陸的投資不斷增加，為保障本身的經濟利益，已令他們重新界定自己的政治立場。工商界從80年代的「恐共」到90年代的「迎共」，已是一種不容否定的事實。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能落實，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受到本港工商界的一致反對。

工商界明白到在未來的議會政治中，他們不會佔大多數。但另一方面，議會政治所著重的是議事和辯論，工商界可透過進行游說及發展強而有力的理性分析，從而影響政府的施政和立法局議員取向。除了以上提及那兩分長期經濟研究報告，工商專聯亦曾進行其他社會問題的研究，例如1991年的社會保障研究和香港通脹問題研究。

經濟策略是一種政治選擇

在《香港廿一》的引言中，報告聲稱研究無意討論九七年前後的香港政治的演變。這種說法無疑將經濟策略視作一項技術層次的研究，令人覺得報告提出的建議祇是透過一系列理性分析而得出的結果。當然，這祇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本港未來的經濟發展策略，與中港關係與本港政治的發展有著重大的關係。《香港廿一》內的建議，其實已反映工商界對中港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的一系列假設。

這些假設可以從比較 1989 年及 1993 年的研究報告中顯示出來。在 89 年的研究報告中，建議的經濟發展策略是十分強調維持香港高度自主及獨特經濟的法律基礎。但在今年的報告中，建議的經濟策略是強調要加強與中國不同層次上的聯系；例如建議建立通行無阻的邊境，輸入更多國內勞工，以至華南地區基建共同發展的構思等。

97 年香港會回歸中國，相信不會有人反對中港間的聯系應日漸加強。但中港間的經濟發展所涉及的範圍、深度，以至速度，都會影響中港間的權力分佈，未來特區政府的角色及本港內部的資源分配，這些選擇很明顯是政治決定，並不是單靠經濟分析便可以解決的問題。

《香港廿一》一方面認為應維持本港「多元化和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決策和規劃」，但另一方面卻大力鼓吹政府要為工商界在基建、人力、及土地方面的需求作出更大的承擔。《香港廿一》的信息表面上是希望加強工商企業的承擔感，提供一個誇越九七的經濟圖象；但骨子裏卻集中爭取工商界本身的利益。

強弱懸殊的政策分析力量

《香港廿一》的其中一項建議是由工商界贊助成立獨立的研究中心及智囊團，研究多個行業的宏觀經濟及策略性問題。智囊團在西方議會政治中日漸普遍，據估計，美國有 1000 多個智囊團的組織，其中有大約 100 個是在首都華盛頓。很多這些智囊團都有特定的政治取向，例如布瓊施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e）被認為是親民主派的，而美國企業研究中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是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智囊團的中立性，一向是受到各方的質疑。

香港的工商界十分清楚階層利益是需要龐大的組織和資源來支持的。工商專聯表面上是祇談經濟，極力保持政治低調的形象。但他們其實是在結合工商界的龐大資源，不斷投資進行大型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目的是將工商界的意見和看法，透過學術和理性分析的包裝，使其更有說服力和可行性。

反觀本港的民主派，一直為著立法局內直選議席問題疲於奔命。根本沒有時間和資源進行什麼大型的政策研究工作。民主派如何急起直追，相信是一個迫切思考的問題。